本版编辑：杨志梁
E-mail：m4@studytimes.cn
Tel：010—62806049

“十三五”：以服务业主导适应引领经济新常态

热点透析

□ 迟福林

我国正处于走向服务业主导的历史节点，把握增长、转型与改革的主动权，关键是“十三五”在走向服务业主导的经济转型升级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尽快形成服务业主导的产业结构。

2015年5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华东7省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上指出，要深刻把握国际国内发展基本走势，坚持立足优势、趋利避害、积极作为，系统谋划好“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可以说，“十三五”是我国经济转型升级、调结构、转方式的“最后窗口期”。

总的判断是：我国正处于走向服务业主导的历史节点，把握增长、转型与改革的主动权，关键是“十三五”在走向服务业主导的经济转型升级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尽快形成服务业主导的产业结构。

经济转型升级的基本趋势与突出挑战

“十三五”我国加快经济转型升级，是内外发展环境深刻复杂变化背景下的现实性选择、战略性选择和主动性选择。这就要求我们客观把握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基本趋势。

一是工业转型升级大趋势——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智造”。第一，“十三五”是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与我国工业革命的历史交汇点。当前，我国已经成为一个制造业大国，成为世界工厂，但还不是制造业强国。未来几年，如果加工制造为主的格局不改变，势必在多方面处于被动的状态。这就客观上要求我们牢牢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的重大机遇，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推动工业的转型升级。第二，“十三五”我国将进入“互联网+”的新时代。依托新信息技术，“互联网+”将带动我国工业信息化的新突破。第三，“十三五”我国将开启一场以智能化为重点实现制造业的革命。预计未来几年以高铁为代表的装备制造业发展将会取得重大突破。

二是城镇化转型升级大趋势——从规模城镇化走向人口城镇化。第一，我国城镇化仍处于较快发展阶段。未来5~10年名义城镇化率仍会以年均1%~1.2%的速度推进，到“十三五”末期名义城镇化率有望提高到60%左右。第二，“十三五”是我国形成人口城镇化新格局的关键时期。2013年我国人口城镇化率仅为36%，与2012年世界平均52%的人口城镇化率水平有较大差距。随着户籍制度改革的突破，未来6年人口城镇化率有望以年均2%~3%的速度推进，到2020人口城镇化率有望达到50%左右。第三，“十三五”有望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历史性突破。从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看，城乡一体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不断深入，未来几年城乡一体化在制度与政策层面有望实现重大突破。

三是消费结构升级大趋势——从物质型消费走向服务型消费。第一，从生存型消费向发展型消费升级。我国已经从生存型阶段进入到发展新阶段，城乡居民的吃饭穿衣等生存型消费需求基本解决，而与人自身发展相关的健康、教育、医疗等发展型消费支出开始全面快速增长。第二，从传统消费向新型消费升级。以信息消费为例，近年来我国信息消费规模以每年20%~30%速度快速发展。估计“十三五”新型消费年均增速将保持在15%~25%的水平。第三，从物质型消费向服务型消费升级。这是消费结构升级最为突出的特点。我国城镇居民服务型消费接近40%，预计到2020年服务型消费占比将提高到45%，一些发达地区甚至可能达到50%以上。农村居民总体上正处于由日用消费品为主向耐用消费品为主转变的阶段。在这个特定背景下，“十三五”我国将形成消费主导的经济增长新格局。

“十三五”经济转型升级面临三大挑战。

一是创新不足。创新不足仍是我国经济转型升级面临的突出矛盾。比如，我国以研发为重点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生产性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只有15%，而发达国家德国生产性服务业占服务业的比重在70%左右，占GDP的比重在30%~40%。

二是产业结构与发展趋势不相适应。突出表现在服务业比重偏低。进入工业化中后期服务业占比明显提高是一个基本趋势。2014年我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为48.4%，2015年第一季度达到51.6%，这是个历史新高。但仍然远低于2000年发达国家70.1%的平均水平；与同为金砖国家的巴西（2013年69.3%）、俄罗斯（60.3%）、印度（57%）相比，也有较大差距。

三是改革尚未实现重大突破。第一，服务业市场开放度不够。服务供给不适应服务需求的重要因素在于服务业市场垄断，尤其是行政垄断。以教育为例，教育体制“考试型、封闭式、行政化”的特点十分突出，不仅有违教育发展规律，而且也很难满足全社会的教育需求。第二，结构性矛盾还相当突出。目前我国财税结构、金融结构、教育结构同经济转型大趋势不相适应矛盾日益突出，“加大结构性改革力度”的要求明显增强。第三，在某些方面制度化、法治化环境尚未有效形成。比如，尽管这些年法治政府建设有明显进展，但还面临相当艰巨的任务，需要加快推进。

形成服务业主导的经济结构牵动影响转型发展全局

“十三五”我国基本形成服务业主导的经济结构的客观基础正在形成。实现这一转型，既可以在结构升级的基础上形成7%左右的经济增长新常态，又能够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创造有利条件。

形成服务业主导新格局的需求明显加大。一是工业转型升级对现代服务业的依赖全面增强。第一，创新对生产性服务业的依赖性增强。在工业化发展初期，生产性服务业的作用并不大。进入工业化中期，尤其是进入工业化中后期，生产性服务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第二，制造业转型升级对互联网发展的依赖性增强。“互联网+”时代，离开信息化，离开“互联网+”，制造业转型升级就比较困难，形成现代服务业发展的重头戏和突出优势就比较困难。第三，企业发展模式转型对服务型经济的依赖性增强。企业的产品创新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企业商业模式的创新。苹果之所以能够打败诺基亚，关键在于苹果的服务模式发生了重大变革。只有包括服务模式在内的商业模式变革能够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变革的趋势，企业才能在新阶段的市场竞争中抢占先机。二是人口城镇化对服务业发展的需求全面快速增长。进入工业化中期之后，全社会对城镇化的需求和期望发生历史性变化，尤其是对城镇化的就业、居住等需求全面快速增长。“十三五”时期从规模城镇化走向人口城镇化，意味着近4亿农业转移人口将要进城，这带来巨大的教育、医疗等需求，并为生活性服务业释放巨大的市场空间。三是消费结构升级对现代服务业需求明显增强。以教育为例，2014年，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30万左右，同比增长16%。中国在美留学生占了全部国际学生的31%，2014年为美国经济贡献了约220亿美元。满足消费结构升级带来的服务型消费需求，客观上要求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扩大服务的有效供给。

以服务业主导释放经济发展的巨大潜力。一是以服务业释放消费的巨大潜力。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蕴藏着巨大的消费潜力。估计到2020年消费市场的总规模将从2014年的26.2万亿元人民币提高到45万亿~50万亿元人民币，仅用6年时间就可以实现消费规模倍增。二是以服务业释放城镇化的巨大红利。我国新型城镇化将释放巨大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如果名义城镇化率从2014年的54.8%提高到2020年60%左右，将带来42万亿元人民币的投资空间。三是以现代服务业发展形成创新发展的巨大动力。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的大发展，不仅将带来市场规模的扩大，更会形成创新发展的巨大动力。预计未来几年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将快速发展。

把形成服务业主导新格局作为“十三五”的基本目标要求。当前，对走向服务业主导的判断，还有某些争议。但从各国发展经验看，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经济服务化是一个客观趋势。尤其是工业化中后期，工业与服务业的深度融合日趋明显，制造业的信息化、服务化、全球化特点十分突出。没有现代服务经济的发展就没有现代工业。从这个意义上说，发展服务业不是不要工业，而恰恰在新一轮工业革命趋势下通过发展以研发为重点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带动新型工业发展，推进工业的转型升级。

以服务业主导适应引领经济新常态。目前我国正处于走向经济新常态的关键时期，形成服务业主导新格局适应引领经济新常态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一是形成中速增长的新常态。近几年，我国服务业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带动GDP增长约0.4个百分点。如果“十三五”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0%，可以带动经济增长4个百分点左右，为中速增长奠定重要基础。二是形成新增就业不断扩大的新常态。从近两年情况看，服务业每增长1个百分点能吸纳约100万个新增就业。“十三五”服务业年均增长10%，年均吸纳新增就业将达到1000万人左右，成为吸引就业的主要渠道。服务业主导的经济转型不仅是形成新一轮创新创业潮的主要推动力，而且将为创新创业开辟巨大的市场空间，成为创新驱动的重要条件。三是形成利益结构和社会结构优化的新常态。服务业是“白领”就业的主要行业。到2020年，如果服务业主导格局基本形成，我国在服务业就业的人口将不少于4亿，由此将带动中等收入群体的增加。四是形成绿色发展的新常态。走向“绿色现代化”，关键是推进服务业主导的产业结构转型。服务业对资源能源的需求较低，可以有效地摆脱重化工业的路径依赖，形成绿色发展的新常态。如果2020年服务业占比达到55%，能源消耗量将下降14%左右，SO_2将减排18%左右。

互联网金融与中国改革

□ 陆 琪 杨 益

当前，互联网金融由于其处在互联网的时代前沿属性和金融的财富效应的交叉点，已经成为目前最时髦的话题。虽然互联网金融兴起的时间并不长，从2013年余额宝骤然发力以来也不过2年多一点的时间，与我国将近40年的改革历程相比还很短，但是互联网金融所呈现出来的爆发力和影响力，对未来实现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互联网金融的弯道超车表明经济结构转型的具体方向。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末，中国互联网金融的总规模已经超过10万亿元，最主要的第三方支付9.22万亿元，P2P达到1000亿元，总数超过1500多家，其他的基于电子商务的网络小贷、基金销售等均超过5000亿元。互联网金融虽然肇始于国外，但中国的互联网金融发展速度和用户规模在世界范围内都处于首屈一指的地位。今天已经很少有人再以美国没有什么互联网金融来否定中国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前景，在经济和技术发展领域，并不是什么事情都一定要以国外有没有、国外发展得好不好为标准。我国传统金融体系的薄弱和一些体制机制弊端与人口密集众多这样几个本来是劣势的因素结合起来，却反而成为互联网金融发展的热土。借助于互联网的长尾效应和因传统金融体系下不完善而存在的广阔市场空间，中国在互联网金融领域实现了弯道超车。下一步中国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方向，可以在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基础上，向建设互联网金融的国际性组织、制定国际通用的互联网金融规则方面努力，把中国的互联网金融技术优势进一步向战略性优势发展迈进。

互联网金融的兴起和跨越式发展，给中国经济发展和结构转型带来重大启示。充分利用好“互联网+”的催化作用，能够使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扬长避短，化劣势为后发优势。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过程中用好“互联网+”能够极大提高生产生活效率，甚至能够减少污染，保护环境。比如一度流行的“打车”软件，据一些出租车司机说，拉同等数量的业务每天可以减少空驶50公里左右，每辆车每天减少3升的油耗，北京有69000辆出租车，如果有三分之一的车每天少烧3升汽油，那么每天就节约了69000升汽油，减少了大量的汽车尾气排放。最近流行的专车、快车，在给广大消费者带来便利的同时，不仅节约了能源，还对陈旧僵化的、长期难以改革突破的出租车管理体制产生了冲击。出租车管理体制实际就是当前改革难点的一个缩影，十几年来，无论老百姓多么怨声载道，无论出租车司机是多么辛苦艰难，既得利益把持下的陈旧体制就是纹丝不动。现在通过互联网，从根子上断了既得利益的粮，使这一不得人心的陈旧体制不得不改革。

互联网金融的普惠功能昭示中国改革的目的和任务。当前互联网金融在发展过程中虽然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互联网金融的普惠功能正在日益显现。有人诟病互联网金融中的一些P2P企业利息比银行高，并以此否认互联网金融的普惠功能。对此，很多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实际上普惠首先要解决的是可得性的问题，利息再低拿不到贷款的话，对广大中小企业、广大农民来说都没有意义。其次，从市场上的实际利率水平来看，民间借贷利率自互联网金融兴起以来一直处于下降的趋势当中，许多中小企业和农民都确确实实已经从中获得了实惠。再次，许多互联网金融企业以“三农”作为主要的目标市场，传统金融的资金流动特征，从发达地区、城市募集资金投向广大农村和不发达地区，普惠功能一览无余。此外，第三方支付等基于互联网的金融服务极大地便利和满足了边远山区农民和荒凉草原上的牧民等等处在交通不便地区的老百姓的金融需求。

互联网金融通过着力解决农村金融需求问题、解决金融二元化结构当中弱势一方的需求，从而实现普惠的目标。当前中国改革任务也是要通过体制机制的改革来改变贫富差距过大等等人民群众还不满意的诸多问题。“互联网+”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讲究用户体验，用户还可以评判打分，我们改革的任务，也是要让人民体验到更好的公共服务，人民可以有序参与社会管理并给政府打分评价。



互联网金融在发展过程中以第三方支付为起点，逐步走向平台化、社交化，诸多互联网金融企业都在构建自己闭环的生态圈和生态系统，从社交起步的正在补足电子商务短板，从电子商务起步的努力营造社交平台。虽然每个互联网金融企业都是从自己的商业目的出发希望通过给予用户最好的体验来吸引最多的消费者，但客观的结果是整个互联网金融行业在营造宏大的金融服务体系。

互联网金融的监管争议凸显中国改革的路径选择。金融在现代经济体系中具有核心地位，金融行业的较强的外部性使得对金融的监管不可或缺。我国作为转型中国家，由于长期计划经济的影响，监管总是处在一种宁枉勿纵的状态。这虽然使我们国家躲过了东南亚金融危机，也减少了美国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但是也造成了我国金融长期的压抑状态，尤其表现为农村和不发达地区、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的缺失。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一方面使过去这些金融服务不到位的金融需求方获得了较好的金融服务；另一方面由于缺乏监管，鱼龙混杂，也掺杂着一些违法犯罪行为，损害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在这种情况下，对互联网金融如何监管形成了诸多不同的意见。有人认为，余额宝之类的互联网金融产品扰乱了金融秩序，抬高了存款成本，应当直接加以禁绝，这种观点目前已经不太有市场。较主流的观点认为，对互联网金融要采取底线监管的原则，守住不触发系统性风险的底线，从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和维护金融市场秩序两个角度出发进行适度监管。客观来讲，这个监管理念非常不错，但问题在于如何落实。

这里的关键在于两点：一是要大力推进社会自治，让社会自治组织更多在市场经济的自律当中发挥作用，这样市场主体和管理者之间能够更充分地进行交流、博弈并形成有效的规则；二是要扩张市场主体的诉权，必须要使市场主体对不合理抽象行政行为，尤其是对部门规章这一最可能设置玻璃门的层级的规范拥有诉权，最大可能地压缩部门利益、权力寻租的空间。这两点归结起来是一点，就是要用法治来加强民权、监督和限制公权。这既是中国互联网和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要走的路，也是中国改革事业要走的路。

宏观观察

“一带一路”战略助力人民币国际化

人民币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很好的使用机会，大宗商品贸易、基础设施融资、产业园区建设、跨境电子商务，以及亚投行、丝路基金等多边金融机制，都可以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突破口。

□ 高惺惟

当前，我国正在积极推动“一带一路”战略规划。人民币在沿线国家有很好的使用机会，大宗商品贸易、基础设施融资、产业园区建设、跨境电子商务，以及亚投行、丝路基金等多边金融机制，都可以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突破口。

建立区域性贸易和投资的结算支付体系。在充足的外汇储备、庞大的外贸规模、相对完善的金融机制的支持下，人民币有能力主导建立区域性贸易结算支付体系。在这个过程中，商业银行应积极推进人民币与沿线国家货币的报价和直接交易，进一步扩大人民币在贸易、投资中的使用范围，降低使用第三国货币对双边贸易往来的不利影响；应积极创新人民币风险规避与资金增值产品，打消沿线国家企业使用人民币的后顾之忧，并进一步促进人民币用于沿线国家资产计价、纳入沿线国家储备货币，提升人民币接受程度。

稳步放宽跨境资本交易限制。“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必然会加快各国货币与人民币的兑换速度与频率，促使对人民币可自由兑换需求的加大。为应对此情形应做到：一是积极引导证券市场和个人资本项目的逐步开放。同时制定外汇应急措施，比如采取对跨境资本流动征税等方式。二是积极放开对直接投资方面不需要的管制和限制，发挥其市场自由机制。三是对资本账户不能开放的交易项目严格把守，审慎放开货币市场等短期资本账户。四是资本账户开放要与其他金融改革整体推进，对外金融开放的同时要注意对内金融开放，人民币汇率和利率市场化不一定要先于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五是加强跨境资本流动的监管机制和预警机制建设。建议与境外国家和地区建立双边的信息交换和统计监测的合作机制，共同对人民币突发性流动加强监测和限制，以便及时、准确掌握境外国家和地区接受和使用人民币的状况，制定必要的防范和化解措施，减少金融风险。

人民币汇率应紧盯“一带一路”主要国家的货币，而非只盯美元。我们不能简单地将美元与人民币的双边汇率作为人民币整体的对外汇率。我们需要用一篮子货币，特别是“一带一路”主要贸易伙伴的货币，来衡量人民币汇率，也就是要使用实际有效汇率来判断人民币的升值或贬值。在时机成熟的时候，效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的模式，在亚投行内确立成员国中的几种主要货币作为储备货币，建议包括人民币、欧元、英镑和卢布等，构成新的特别提款权。

通过支持对外直接投资、扩大境外人民币贷款和配套援外规划等措施加大资本输出。对于资本输出而言，采用何种币种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目前以美元为主，则“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势会受到美国货币政策及币值的变动的直接影响，进而影响到资本对外输出的效率。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可考虑通过适当贴息等优惠政策吸引企业以跨国并购、设立境外产业园区等形式，在转移产能、扩大市场、抢占渠道和获取高新技术等领域，开展人民币对外直接投资，逐步改变当前对外投资中以外币为主的情况。

我国银行业须加快国际化进程，增加我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使用人民币的便捷性。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我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会加快，我国将由制造业大国逐渐发展成为对外投资大国，由资本输入为主的单向资本流动转变为资本输出占重要地位的双向资本流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要鼓励我国企业对外投资过程中尽量使用人民币，另一方面作为提供基本金融服务的银行业也需要及时跟进国家的对外开放战略，寻求在海外的业务发展机会。我国银行业要积极进行海外机构布局，加大海外网点扩张，构建多层次的海外机构网络。银行业海外发展可以更多地通过跨国收购进行，这样可以快速拓展海外业务，方便融入当地主流市场，快速在海外市场占据主导地位。

采取以多种货币入股亚投行的模式，推动人民币走出去。鼓励成员国使用人民币、欧元、英镑和卢布等亚投行成员国主要货币入股。加大人民币与各成员国货币的互换额度，解决部分中小国家因上述四种货币储备不足无法入股的问题。在特殊情况下，允许部分成员国使用本国货币入股，同时建立我国中央银行与亚投行的货币互换机制。

将亚投行打造成重要的人民币债券发行方。亚投行不可能只靠资本金运营，需要引入其他资金来源。这就需要设立投资基金作为融资方式的重要补充，以向亚投行支持的项目提供融资。该投资基金应大力支持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模式，鼓励私营部门的参与，动员更多私人部门的资金，吸引其他商业银行投资；与此同时，还要发行长期债券，构建亚投行成员国区域债券市场，推动各成员国之间债券投融资方面的合作。